

中共開國後第一文化罪案考

◎ 何平華

一 引言

陶行知（1881-1946）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論家。1917年秋，陶行知留美學成歸國，途中他就滿懷豪情地表示：「要使全國人民有受教育的機會。」¹自此以後，陶行知便全心地投入了為建立中國現代教育體制的教育改革活動和為培育現代國民的普及教育運動。陶行知在長期的教育實踐活動中不斷探索，並根據中國的國情，將杜威（John Dewey）「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學中做」的理論修正改造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者互相關聯的系統生活教育理論。

陶行知的教育實踐活動和生活教育理論，不僅在中國近代教育界、思想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且對中共革命也產生了相當重大的影響。文革後出版的《周恩來選集》，首次披露了毛澤東關於認識到中共革命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中心思想的源由時說²：

「五四」以後，毛主席參加了革命運動，就先在城市專心致志地搞工人運動。那時陶行知先生提倡鄉村運動。惲代英同志給毛主席寫信說，我們也可以學陶行知到鄉村裏搞一搞。

不僅如此，1942年2月，直屬中共領導的中央研究院肯定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的進步性和人民性，並拿來作為中共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理論，同時在中共所屬的各解放區實際教育活動中推廣運用。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病去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出於反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鬥爭需要，藉機在全國各地動用力量，掀起了大規模的追悼陶行知的活動。1946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與陝甘寧邊區政府各界代表兩千餘人，在延安舉行追悼大會。會場中央有毛澤東敬獻的花圈，上題：「痛悼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陸定一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發言，讚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正是為人民服務的教育思想」³。

然而，毛澤東在中共建國後不久，即發動和製造了開國後第一件文化罪案，通過批判電影《武訓傳》，進而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其奧秘究竟何在呢？本文試圖對中共開國後的第一件文化罪案產生的諸原因、背景、發動者毛澤東的內心世界作一考析。

二 從批判電影《武訓傳》到批判陶行知

（1）頌陶之聲漸行漸遠

1947年10月，毛澤東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以充滿自信的語調說⁴：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之後，……現已大舉反攻。……我軍所到之處，敵人望風披靡，人民歡聲雷動。整個敵我形勢，和一年前比較，已經起了基本上的變化。

隨著中共軍隊在戰場上轉守為攻，中共借重民主力量在第二戰線發動「討伐」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的作用和意義就大為降低了。這時，紀念陶行知集會的規模變小，出席的中共領導人物的身分也降低了。不僅如此，在解放區的「有些地方教育工作者對陶氏表示了輕蔑的態度，公開在雜誌上諷刺他是爬行的經驗主義者，說他是『教育救國論』者」⁵。

這使陶門子弟和朋友們感到不平，於是就推陶行知的學生、時任蘇皖邊區教育廳副廳長的戴伯韜出來講幾句話。戴伯韜在1947年10月寫成《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學說》一書，認為陶行知的教育主張與新民主主義教育二者「大同小異」，並進而明確指出，陶行知是「新民主主義教育理論與實際的創始者之一」⁶。但是，隨著中共建國後對陶行知評價的變化，陶門子弟一廂情願的熱情稱頌，似乎只是中共頌陶曲的曲終餘音。

1950年7月，《人民教育》以紀念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為名，推出「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專號。然而，在指出陶行知教育思想具有革命的民主精神後，卻一反以往全面肯定的評價，非常突兀地強調：「今後批判地接受陶行知的教育學說遺產，成為全國教育界的重大工作了。」⁷

「曲終人不見」，陶行知在中共建國後的第一個忌日，已被貶為需「批判地接受」的對象了。

（2）江青、毛澤東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

在中共建國後，曾被陶行知照拂的江青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是陸定一，常務副部長是胡喬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是周揚。

在1950年上半年，江青幾次提出要批判電影《清宮秘史》，說是「賣國主義」的影片。但江青的觀點和要求，遭到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等的反對和抵制，並說：「某某同志（按，即劉少奇）認為這部影片是愛國主義的」⁸。而毛澤東在聽取了江青的匯報後，也沒有進一步表示支持江青批判劉少奇等認為是「愛國主義」的影片。

不過，江青仍然關注著其熟悉而又有興趣的電影界動向。不久，江青就瞄上了電影《武訓傳》。武訓，原名武七，清末的東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興學」，辦了三所學校，受到清政府嘉獎，封為「義學正」。陶行知自推行平民教育運動起，就一貫提倡發揚光大武訓精神，讚賞武訓苦行興學的品質。早在1944年夏天，陶行知就鄭重拜託左翼電影工作者孫瑜將武訓事跡拍成電影。孫瑜經幾年努力，最後由崑崙影片公司在1950年底將《武訓傳》攝製完成。

1951年2月，電影《武訓傳》在上海和南京公映，獲得輿論盛讚和觀眾熱烈反響。導演孫瑜便

攜片北上，並在2月下旬於北京中南海邀請周恩來、胡喬木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觀賞。孫瑜回憶說⁹：

《武訓傳》作為一集在中南海放映，長達三小時。我注意到，大廳裏反應良好，映完獲得不少的掌聲。朱德同志微笑著從老遠的坐間走過來和我握手，說了一句：「很有教育意義。」

在周恩來提了若干修改意見後，《武訓傳》便正式在北京公映，並且獲得成功，一時佳評如潮。

毛澤東、江青也在稍後調看了《武訓傳》影片，毛卻斷言這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片。

當江青向中央宣傳部提出要批判電影《武訓傳》時，周揚開始不同意，並頂撞道：「你這個人，有點改良主義，沒有甚麼了不起嘛！」¹⁰但當周揚聞說這是毛澤東的指示後，便乖乖照辦了。1951年4月20日，周揚在政務院第81次政務會議上匯報「1950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與1951年計劃要點」時，最先點名批評《武訓傳》「是一部對歷史人物與歷史傳統作了不正確表現的，在思想上錯誤的影片」¹¹。周揚並組織了一些秀才，在4月25日出版的《文藝報》四卷一期上刊出一組批判文章，內有賈霽的〈不足為訓的武訓〉和江華的〈建議教育界討論《武訓傳》〉，又重載了魯迅1936年有關談武訓的一篇雜文〈難答的問題〉。5月8日，周揚的報告於《人民日報》正式發表。

至此，毛澤東、江青正式下令中宣部、文化部展開批判電影《武訓傳》的運動，由原來反對批判者周揚拉啟了正式批判的帷幕。

（3）批判鋒芒轉向陶行知

周揚組織的人馬，即賈霽之文，雖指出武訓其人不足為訓，但尚認為陶行知表揚武訓精神情有可原，因為這與陶「當時所處的環境與條件有著極有意義的關係。那時候，國民黨萬惡統治下的白色恐怖環境與條件，對於人民教育家的為人民服務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壞阻撓；這樣，提出武訓精神來，有著積極的作用。陶行知先生當時是對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¹²。

毛澤東和江青顯然不滿周揚主持的這種區分論述的批判方式。於是，毛親自發出指示，由江青指定時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許立群，以楊耳為筆名，在該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藝報》四卷二期上，發表〈試論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一文，針鋒相對地批駁賈文。文章認為，「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訓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揚的」；陶行知先生在蔣介石反動統治下表揚「武訓精神」，也沒有甚麼「積極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在反動統治下宣揚『武訓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權之後宣揚『武訓精神』，它的危害決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說是可能更大些」¹³。同期《文藝報》還刊有鄧友梅的〈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一文。

5月16日的《人民日報》轉載了楊耳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號召大家深入討論。5月2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醒目地推出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這是《人民日報》第一次為批判一部電影而發表社論。更重要的是，這篇社論由毛澤東親自撰寫。文章嚴

厲地說¹⁴：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爭鬥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這無疑是不指名地批判陶行知宣揚武訓精神是「反動宣傳」。於是，上至朱德、周恩來、陸定一、胡喬木、周揚，下到陶門諸子弟及一般肯定武訓之民眾，如不批判陶行知宣揚的武訓精神，便都成了承認或者容忍這種「反動宣傳」了。社論最後號召：「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¹⁵

配合毛澤東寫的社論，《人民日報》同日還發了七篇批判文章和讀者來信。同時，在該日報刊上的「黨的生活」欄中，在〈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的標題下，號召全體黨員「積極起來自覺地同錯誤思想進行鬥爭」¹⁶。

自此之後，以《人民日報》為首，全國各地報刊掀起了批判熱潮，許多文章的矛頭直接指向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例如，5月29日的《人民日報》刊有署名丁曼公寫的〈武訓真面目〉一文，批判陶行知「看不清武訓這個封建主義的奴才面目，把他當成改良主義的老師，這是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政治資本貧乏的狀況」¹⁷。

6月2日，中宣部負責幹部李一氓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清除武訓一類的錯誤思想〉一文，認為清除陶行知的錯誤教育思想是這一回思想鬥爭的「基本內容和重要內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感染有武訓思想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應該受到檢查的若干種舊教育思想之一，不應該因為他本人盡力於反國民黨的革命鬥爭而遷就他的教育思想，無原則地加以原諒或贊成」¹⁸。

江青為了積極配合毛澤東領導發動的批判運動，在同年6月發起組織了一個以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為主的「武訓歷史調查團」，到山東武訓家鄉進行實地調查。調查團總共十三人，江青以「李進」之名參與其中。由於江青的特殊身分和調查團所負的特定任務，被調查的堂邑、臨清、館陶等縣知道了調查團的來意，也就順著調查者的需要，提供種種材料。

調查團在山東各縣逗留了二十多天，返京後便由「李進」為主寫了《武訓歷史調查記》，於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報》連載，然後出版了小冊子。《武訓歷史調查記》的結論說：「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

毛澤東則高屋建瓴地為調查記加上按語¹⁹：

勞動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債主兼大地主的武訓，依靠封建統治勢力，剝削、敲詐勞動人民的財富，替地主和商人辦成三所學校，這種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規律的。……

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使用簡單工具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也沒有要使他們受教育文化的必要。這是幾千年封建制度的規律，是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法則。

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並取消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係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這種可能，在中國的解放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全中國，就有這種可能了。
……

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了，用武訓這具僵屍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應當結束了，被欺騙的人們也應當覺醒了。

毛澤東無情地嘲笑了陶行知這位只生活在中共建國前時代、又沒有去過中共解放區搞教育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指其所從事的一切教育活動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相反更是助紂為虐的，因為陶是利用武訓這具僵屍在搞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毛又指出，一切教育工作者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新教育工作才是有意義的。

根據毛澤東這一指導思想，中央教育部在中共宣傳部門發動對電影《武訓傳》作政治批判的同時，又精心組織了人馬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活動和教育思想。1951年5月1日，中共教育部機關雜誌《人民教育》改組，老教育家成仿吾和葉聖陶被免去正、副主任委員之職，改由教育部第一副部長、黨委書記錢俊瑞任主任委員，教育部副部長柳湜任總編輯，另有兩位教育部副部長韋慤和曾昭掄任委員，組成異乎強大的編輯班子。

5月21日，即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翌日，錢俊瑞便在教育部工作會議上組織動員，並議定立即通知全國教育行政部門和主要學校進行學習和討論，又在《人民教育》發表社論。《人民教育》的社論強調，要求教育界每個人都以《武訓傳》為鏡子「照照自己」，無論是讚頌或發表意見者，都「應該檢查自己的思想，分析自己的錯誤，嚴肅地作公開的自我批評」²⁰。按社論的要求，是用行政命令，搞人人過關式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7月1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發表了一組關於武訓問題的筆談。陶行知的朋友、民主人士馬敘倫，雖然身為教育部長，卻不得不署名方直，發表了題為〈我過去表揚過武訓的自我檢討〉的自我批判文章。文中稱批判電影《武訓傳》是「澄清教育思想上混亂的一個起點」，今後「研究與批評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²¹，則是教育界的一大重要任務。

自此，《人民教育》就成為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要障地。自1951年10月至1953年5月為止，《人民教育》幾乎每期都有批陶的大塊文章或陶門子弟的自我批判、檢討之文，其中不乏上綱上線者。例如1951年12月出版的《人民教育》上刊有署名潘開沛、題為〈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幾個問題的商榷〉的文章，指責陶行知一生「最主要的經濟依靠（階級依靠）是資本家、反動政府、國民黨內的反動派」，而其教育思想則「從始到終基本上都是貫串杜威的學說和階級調和以及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²²。顯然，這是根據毛澤東的觀點詮釋引伸之文。

與此同時，地方黨政部門派出工作組進駐重慶育才學校，以「武訓精神給育才師生思想上的嚴重毒害」為主題，發動全校師生狠揭猛批。陶行知的弟子、校長孫銘勛被批判為是頑固堅持「武訓精神」的典型，是「當前中國教育改革中右翼的代表，代表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

級的改良主義在爭取人民教育事業的領導」²³。

於是，在各教育部門中擔任領導職務的陶門子弟，紛紛被批判、作檢查，直至去職。最先被批去職的是當時擔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長的戴伯韜、重慶育才學校校長孫銘勛和教務主任戴自俺等。稍後，在教育部任司長的張宗麟和方與嚴，則被戴上「右派」帽子去職。陶行知的另一大弟子樸震球也在1957年「反右」時被免掉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之職，轉任政協工作。而陶門子弟中的張勁夫、劉季平、張健、王洞若、董純才、徐明清等早已參加共產黨，建國後已為黨的高級幹部，也不得不在形式上與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劃清界線。而周恩來、吳玉章、謝覺哉、徐特立、陸定一、李維漢、胡喬木等長期以來一直稱頌陶行知為「黨外布爾什維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並定其教育思想為「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理論」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物，自此之後，也只敢言必稱毛澤東教育思想而不敢「思想混亂」說陶了。

自毛澤東發起批判電影《武訓傳》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實踐就被定為杜威之徒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而被抹殺了，陶門子弟在中共教育界的領導地位也就被剝奪了。

三 毛澤東批陶面面觀

(1) 毛澤東批陶的政治原委

毛澤東在中共建國之初，迅即通過批判電影《武訓傳》而轉入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與實踐，並特意貼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標籤而將之打入「反動」的地獄。析其首要動因，顯然是毛澤東急欲樹立在中共教育界的權威指導地位。如所周知，通過延安整風和中共「七大」，毛澤東已確立其在黨、政、軍和文藝等方面的權威地位，毛澤東思想在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中已被定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²⁴，而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則更是文藝界的「文藝憲法」。

延安時代的毛澤東以及以毛為首的中共領導集團，出於對美外交、對民主人士的統戰、對陝甘寧邊區教育發展的實際需要，決定接受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與實踐為中共新民主主義教育理論，並冠以中共教育的「旗手」、理論的「源泉」、中共新民主主義教育的「基石」等等讚詞。然而，這顯然為取得革命勝利後的毛澤東所不滿。一方面因為中共教育界的這種頌陶尊陶之風，是明顯與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之說相對立的；另一方面是原先接受陶行知教育思想與實踐的現實因素已不復存在。毛澤東曾在1950年6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說：「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²⁵，「對知識份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改造」²⁶。由此可見，毛澤東通過批判電影《武訓傳》，進而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與實踐的目的，是要將毛澤東思想定為教育工作者獨一無二的指導思想，從而達到毛對教育界知識份子實行思想改造的目的。

其次，毛澤東批陶也是出於建國初期中共親蘇反美外交政策的需要。1950年10月，正值中共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和美國作正式的軍事對抗。在這種反美的政治形勢下，陶行知作為留美、由美國進步教育運動大師杜威培養的高足，對中共已不再有任何外交和統戰上的利用價值，而且通過批判陶行知還可以告誡大批留美回國的高級知識份子，不得在政治上抱有「親美」的傾向，同時也教育數以十萬計文教工作者在政治上應迅速轉向擁護中共與「親蘇」政策。

在中共親蘇反美的政策主導下，中共在建國初期就開始派遣大批學生到蘇聯和東歐留學，而且在批陶的同時，也不斷宣傳介紹當時在蘇聯教育理論界佔主導地位的凱洛夫「教育學」和馬卡連柯的教育思想。蘇聯教育理論一時間成為顯學。在批陶運動告一段落後，中國教育界在1952年全面推廣蘇聯教育模式。當時中國的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其課程設置、教學計劃、教材和規章制度莫不效法模仿蘇聯。

通過批陶來清肅美國和西方世界教育的影響，並為全面引進蘇式教育鳴鑼開道，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高層批陶或同意批陶的一個趨向性選擇。

（2）批陶是為了抹消〈實踐論〉接受實驗主義的軌跡

毛澤東之所以在中共建國後，首即開展對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批判，我認為還在於毛欲藉此抹消杜威及其中國學生胡適、陶行知的試驗主義思想在哲學上對毛的影響。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是胡適的崇拜者，他曾對美國新聞記者斯諾（Edgar Snow）說²⁷：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據現有資料，毛澤東於1918年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時，曾旁聽胡適教授的哲學和哲學史課程，並拜訪過胡適；他積極響應胡適提倡白話文的主張，身體力行，使其日後能寫得一手很清通的白話文。毛澤東還在1920年5月，特地去聽過杜威在上海的一次演講，由此可見毛澤東曾深受胡適宣揚的杜威思想影響。

毛澤東受杜威另一高足陶行知思想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注重農民運動的思想乃受陶行知啟迪外，在教育思想方面的承襲消化就更多了。例如，陶行知的學生劉季平就很清晰地指出：「假如說解放區新教育思想是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消化了陶行知先生思想而形成的，我以為一點也不為過。」²⁸

此外，在哲學方面，毛也曾受陶行知的「知行」說影響。毛澤東在1938年8月29日，曾對陝甘寧邊區夏訓班學員盛讚陶行知的「知行」說。

1950年2月，毛澤東在行將結束建立中蘇蜜月的旅行、準備回國之際，「斯大林主動提出，為了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建議毛主席把自己寫的文章、文件等編輯成集出版」²⁹。毛澤東欣然同意，並要求斯大林「派一位理論上強的同志幫助完成此項工作」³⁰。斯大林後來便派了尤金來中國。尤金來華後讀了毛澤東一些文章，便向斯大林推薦了〈實踐論〉、〈矛盾論〉。兩文後來在蘇共機關誌《布爾什維克》上發表。在〈實踐論〉發表後，《真理報》發表編輯部文章，向廣大蘇聯讀者介紹並推薦毛的這篇哲學著作。文章認為³¹：

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簡潔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論的認識論——反映論。在他的著作中，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基本原則、關於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關於革命理論在實際革命鬥爭中的意義基本原理……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原理，關於客觀的東西與主觀的東西在認識中的統一的原理。

據擔任〈實踐論〉一文俄文翻譯的師哲回憶說³²：

〈實踐論〉在蘇聯發表後，得到很好的反響，毛主席對此很高興，1950年12月28日，毛主席給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寫信，要求他將〈實踐論〉和《真理報》編輯部評論文章分兩天登報，並囑可先在《人民日報》發表，然後新華社再用文字廣播。12月29日、30日，《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實踐論〉和《真理報》編輯部的評論。

在毛澤東的哲學著述中，〈實踐論〉、〈矛盾論〉是最重要的兩篇文獻。其中〈實踐論〉的副題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再看胡適和陶行知的著作，其中稱認識為思想，喚實踐為實驗或試驗。我認為這只是用詞不同，至於「知和行」的概念是傳統中國式的，而毛、胡、陶在使用這一中國民族哲學詞語時則仍保持一致。

另外，就〈實踐論〉的基本觀點而言，毛澤東強調「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³³，以及「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³⁴。而胡適曾在〈杜威先生和中國〉一文中，闡述其師的「實驗的方法」，強調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而並非天經地義：「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³⁵至於認識的來源，即陶行知說的「真知識」、毛所說的「真知」，人們是怎樣得到的呢？！

陶行知在20年代末便說：「知識有真有偽。思想與行為結合而產生的知識是真知識，真知識的根是安在經驗裏的。從經驗裏發芽抽條開花結果的是真知灼見。」³⁶「經驗又有直接間接的分別……我們必須有從自己經驗裏發生出來的知識做根，然後別人的相類經驗才能接得上去。」³⁷

在闡述人的認識過程方面，胡適和陶行知原都依從杜威的五步法。杜威的五步法是³⁸：

（一）困難之感覺；（二）審定困難之所在；（三）設法解決；（四）在許多方法中選一最有效的試試看；（五）屢試屢驗之後再下斷語。這反省的思想之過程便是科學思想之過程。

但在30年代初，陶行知認為「行動」是思想的母親，於是改造其師之說，在五步法前加上「行動」一步。陶行知的「行動」含義，當然指社會和生活中的實際事物。

探討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有關實踐和認識、知和行之間的演變關係，可以明顯窺見其接受陶行知「知行」說的思想軌跡。

我認為，正因為如此，當〈實踐論〉被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公開出版前，毛澤東便在1951年上半年批判了電影《武訓傳》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為陶行知及其學說貼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標籤，打入禁宮；繼之又連續發動批胡適弟子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思想的運動。

綜上而言，毛澤東為何要在中共建國初期發動批陶的另一深層情結便不言而喻了。

註釋

1 〈陶行知年表〉，《陶行知全集》，卷九（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頁735。

- 2 周恩來：〈學習毛澤東〉，《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333。
- 3 《解放日報》，1946年8月 12日。
- 4 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1131。
- 5；6 戴伯韜：《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學說》（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127；頁134。
- 7；11；23 章開源、唐文權：《平凡的神聖——陶行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頁12；14；23。
- 8 丁望主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卷一（香港：明報月刊社，1967），頁351。
- 9 戴知賢：《文壇三公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192。
- 10 葉永烈：《江青實錄》（香港：利文出版社，1993），頁210。
- 12 《文藝報》，四卷一期，1951年4月。
- 13 《文藝報》，四卷二期，1951年5月。
- 14；15 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53-54。
- 16；17；18 《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5月29日；6月2日。
- 1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401。
- 20；21；22 《人民教育》，1951年6月號；1951年7月號；1951年12月號。
- 24 《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315。
- 25 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同註14書，頁19-23。
- 26 毛澤東：〈不要四面出擊〉，同上書，頁25-28。
- 27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5。
- 28 江蘇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紀念陶行知》（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48），頁179。
- 29；30；31；32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459；459；478-79；479。
- 33；34 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頁261；261。
- 35 章清：《胡適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頁64。
- 36 陶行知：〈「偽知識」階級〉，《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頁141。
- 37 陶行知：〈答朱端琰之問〉，《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頁21。
- 38 陶行知：〈思想的母親〉，同上書，頁139-40。

何平華 1955年生。已完成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課程，現為一橋大學博士後研究生兼橫濱市立大學、神奈川大學等非常勤講師。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